

杨早 萨支山 编

话题

2013



把个性化的思考留给历史

121

物干 物文 編

话题 2013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Copyright ©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话题 2013 / 杨早, 萨支山编. — 北京: 生活·读书·
新知三联书店, 2014.1

(1217 俱乐部·年度书系)

ISBN 978-7-108-04820-2

I. ①话… II. ①杨… ②萨… III. ①社会问题—研
究—中国—2013 IV. ①D66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89205 号

责任编辑 卫 纯

装帧设计 康 健

责任印制 郝德华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
邮 编 100010

网 址 www.sdxjpc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635 毫米×965 毫米 1/16 印张 19.75

字 数 233 千字

印 数 0,001—8,000 册

定 价 34.00 元

(印装查询: 01064002715 ; 邮购查询: 01084010542)

作者简介



杨早 1973 年生于四川富顺，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。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，近年主要关注中国近现代舆论史与文化史、当代文化研究等。著有《野史记：传说中的近代中国》、《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》、《民国了》等著作。



萨支山 1966 年生于福建福州，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研究生结业。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，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，关注左翼文学及 50—70 年代文学。著有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》（合著）。



施爱东 1968 年生于江西石城，中山大学文学博士。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，研究方向为民俗学、民间文学、俗文学，著有《中国现代民俗学检讨》、《倡立一门新学科——中国现代民俗学的鼓吹、经营与中落》等。



贺照田 1967 年生于黑龙江省建三江农业管理局，现任职于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，复旦大学思想史中心学术委员。曾在日本东京大学、台湾东海大学、清华大学等校客座。主要关注领域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和中国现当代文学。



王旭明 语文出版社社长，曾任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兼新闻办公室主任、新闻发言人。多篇文章曾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讨论。著有《为了公开——我当新闻发言人》、《再对教育发言》等。



绿茶 1974 年生于浙江平阳。《绿茶书情》创办者。历任人民网读书频道主编、《新京报书评周刊》编辑、《文史参考》主编。现为《东方历史评论》执行主编。



颜浩 1975 年生于湖南株洲，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，现任职于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。近年来主要关注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潮、20 世纪中国女性文学与妇女生活、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与日常生活史等多个研究领域。著有《民国元年：历史与文学中的日常生活》、《北京的舆论环境与文人团体：1920—1928》等。



黄永 1969 年生于北京，美国《时代》周刊前驻北京记者，现为资深外媒记者、影视制片。曾在《时代》周刊报道封面文章：SARS——*What Did Beijing Know?*、SARS NATION 等。



李芳 1981 年生于江西赣州。中山大学古典文献学博士。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，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戏曲、俗文学。



张慧瑜 1980 年生于山东郓城，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。现任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，从事中国电影史和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，著有《视觉现代性：20 世纪中国的主体呈现》、《影像书写：大众文化的社会观察》、《墓碑与记忆：革命历史故事的偿还与重建》等。



张霖 1976 年生于北京, 中山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。现任职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, 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化研究, 关注 40—50 年代文学史。著有《中国当代文学》(合著)、译著《灰色上海: 1937—1945 中国文人的隐退、反抗与合作》。



陶庆梅 1974 年生于安徽六安,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, 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, 近年来从事当代戏剧评论与戏剧研究工作。



陈均 1974 年生于湖北嘉鱼, 北京大学文学博士, 现任职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。近年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诗歌、昆曲。著有《中国新诗批评观念之建构》、《空生岩畔花狼籍——京都聆曲录》、《也有空花来幻梦——京都聆曲录 II》, 小说《亨亨的奇妙旅程》, 诗集《亮光集》等。



鲁竹 1969 年生于四川成都,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博士。现任职于北京交通大学人文学院, 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元明清词学。

2013：观弈

杨 早

波谲云诡的2013终于过去了。伤痕累累的2013终于过去了。暧昧难言的2013，终于过去了。

《话题2012》的年度关键词是“去魅”，有人说去魅是我们的主张，其实未必。隔着一年，补充解释一下：去魅是去年很多事件的共同指向，比如莫言获诺奖，本身是对诺贝尔文学奖的一种去魅；方韩大战，对两个人都意味着去魅；对于内地香港矛盾的争议，对于台湾想象的讨论，都是在争辩中实现了去魅……但这并不意味着去魅一定是正面的，没有魅化，哪儿来的去魅？而在一段时空之中，某个对象是被魅化还是被去魅，更有利于社会进步与个人福祉？正需要每个人独立思考与判断。

我们为2013总结的年度关键词是“观弈”。大家都知道“烂柯”的传说：晋时王质伐木入山，见数童子“棋而歌”。其中一位给了他一颗枣核，王质含着就不觉得饥饿。不一会儿，一个童子对他说：为

啥还不走？王质回头一看，自己斧子的木柄都烂了。

王质就是咱们这些芸芸众生，拜现代传媒之福，仙人不再是《崂山道士》里月宫中朦胧的身影。走进深山，看见真身，现场感无比强烈，共同呼吸满天的雾霾。只是，他们下的棋，他们唱的歌，你都看见了听见了，你看懂了听懂了吗？你知道下一子走在哪里？你知道下一句歌词是啥？你就是那个傻傻的观弈者，嘴里含着他们给你的枣核。

“观弈 2013”，我脑海里浮现出的，就是一群小人看两位高人对弈，又看不懂，又想看懂，惶恐得不得了，只好苦中作乐，去研究些边边角角：奸情啊，生肉啊，赖账啊，离婚啊，收钱啊，等等。

看不懂，还是要看，要说。这其间的纠结挣扎，是 21 世纪第 13 个年头应当记住的情绪。汉娜·阿伦特曾说：“历史上有许多黑暗时代，在其中公共领域被遮蔽，而世界变得如此不确定，以至于人们不再过问政治，而只关心对他们的生命利益和私人自由来说值得考虑的问题。”2013 不是黑暗时代，但“公共领域”或多或少地被遮蔽，或面临着被进一步遮蔽的危险，我们眼中的世界由此变得不确定，却是当下的真实感觉。人们仍然在过问政治，却大抵是以某种瞎子摸象的方式进行，因为……那是一盘看不懂的棋局。

官媒的复兴

前几年的舆论场给人的印象是：传统媒体（不仅仅是“官媒”）被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打得丢盔弃甲，毫无还手之力。新闻的发源、报道的推进、议题的设置、讨论的深入，都是新媒体在充当急先锋，而传统媒体往往只是跟在后头疲于奔命的跟班。

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，所谓自媒体盛行，催生出海量“公民记者”，只是一种幻象。或许这只是“信息上传方式的转换”：从前人们有苦要诉有冤要伸，会想法上访，会给报社电视台写信打电话，如今许多人则会直接发微博并@“大V”们——这样可以尽可能地绕开进入舆论场的门槛。可以想象，那些舆论场的“看门人”不会愿意看到这样的图景大量衍生、复制。传播学有句俗语“没有进入媒体的事实不是事实”，控制舆论场的关键还是控制媒体，重点自然是新媒体。

棋是一步一步下出来的。去年曾喧闹一时的“媒体人去V运动”已经伏下了清理自媒体的端倪。在自媒体与信息的海洋中，“加V”是增强信息源公信力的捷径，那么，要求从业人员不得以媒体认证身份发布信息，自然是消除舆论干扰的良方。

2013年1月的“《南方周末》新年献词事件”其实还是传统媒体内部的权力/权利之争（当然背后也是理念之争），然而借助新媒体的传播，这场争斗不再像从前那样只在内部发酵，而是迅速形成公共事件，并以“南周部分人员签名公开信”与“工作人员被迫交出官微密码”为引爆点，彻底将这种分裂曝光于天下，也将“官方解释”的权威性消解殆尽。

熟悉《南方周末》与中国报业生态环境的人都知道，凭恃长官意志的临时撤稿换稿，在中国媒体圈可谓司空见惯，但此次事件的外部性却超越过往：以是否刊发、如何刊发《环球时报》评“南周事件”的社论为分界，中国的报纸几乎进行了一次公开站队，其中如《新京报》的对抗未果成为将事件悲情化的又一推进力。正如人民网评论指出：“这样的公开冲突在中国媒体中相当罕见。”

“南周献词事件”在幕后的博弈之下平静收场，然其“争夺舆论

权”的符号意味已经展露无遗，“舆论斗争”这一说法也渐渐密集地出现在官方媒体上。迨至9月2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评论文章《在意识形态领域领导干部要敢于亮剑》，同一天，《北京日报》发表评论文章《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要敢于亮剑》，敏感的人都感觉到了风雨欲来的气息，年末回顾，这场大戏仍然比预想中的更戏剧化。

薛蛮子嫖娼被捕、《新快报》头版呼吁“请放人”，无疑是这场大戏的华彩段落，而且都是同样的出人意料。与立二拆四、秦火火因造谣传谣被捕不同，薛蛮子因嫖娼被捕，却在央视上大谈“当‘大V’的感觉像皇上批奏折”；陈永洲被警方带走的理由是“损害商业信誉”，而他的央视自证只证明了他接受贿赂。说白了，惩治对象的供述内容与罪名明显分离，而且新闻媒体在庭审前如此深度介入是否合理，都有争议，然而，污名化的传统利器“作风问题”与“经济问题”，已经足以让舆论场的风向逆转。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卓有成效的“敢于亮剑”？

“亮剑”或许还意味着官媒向新媒体进军的步伐加快，在这一年，《人民日报》、新华社的官微都一改往昔的高举高打，呈现出“接地气”的诸般情状，让习惯于官媒同声和调的受众颇为意外——很多人惯于将所有刊于官媒的言论都视为“官媒的声音”，但事实证明，在很多事件中，官媒的表达同样有歧见、有分别，即如有人奇怪于“《人民日报》”为何对《小时代》“又捧又打”，其实或许是官媒也在容纳某类观点的多元。看客也该换换脑筋了。

官媒的复兴，原因有权力的庇佑，也有自身的革新，舆论场的转眼颠覆，打破了许多人前两年的迷梦。或许结结巴巴地接受央视采访的“大V”潘石屹说得对：“左派右派，主张的都是旧的形态……互联网时代，一定会有新的政治形态、新的舆论场。”

当母亲的与当律师的

2013年最走红的身份，无疑一是母亲，一是律师。一位位母亲，一名名律师，在各种案件与舆论的旋涡中，成了今年最鲜亮的标识符。

今年有那么多不知名却令人牵挂的母亲。那位长春被掐死男婴的母亲，那位北京被摔死女婴的母亲，那位山西被挖眼孩童的母亲，那些被校长带去开房的小学生母亲……她们在新闻中几乎是隐形的，不去打扰她们或许体现了媒体与公众的慈悲，但她们将迎来怎样的明天？将如何面对余下的岁月？有儿女无儿女的人都在震惊与同情中扪心自问，不寒而栗。

那些媒体与公众认为应当惭愧的母亲呢？南京任由两个女儿在家饿死的母亲乐某，佳木斯诱杀好心女孩的孕妇谭蓓蓓，还有沈阳“为培养女儿独立性”诈称自己是养母的申女士，浦江为儿子喝酒向省委组织部长求援的“楼晓芳”，人们以她们为例，在质问：她们这样做母亲对吗？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做母亲？

上述这些母亲的形象，令人同情也好，痛恨也罢，其实是残缺不全的。我们并不了解她们的过往经历、生活图景与思维方式，我们只是经由新闻的猎奇细节知晓事实的一鳞半爪。我们愤怒，我们震惊，是因为这些信息碎片如同《地心引力》中的太空暴雨，击中我们为之忧虑已久的人伦关系，将其中血淋淋的一面暴露于公众眼前。

而那些举国知名的母亲，她们的形象要丰富、复杂得多，由此也引发了更巨大的争议。唐慧、张晶、梦鸽、谷开来，她们的案件引起舆论震荡，她们与各自儿女的故事，成为中国社会最强烈关注的亲子案例。正是在与法庭、与律师的往复博弈之中，她们的名字、形象，

一次次登上媒体的头条，人们一次次谈起：她们对待儿女的态度，为儿女所做之事，会带给孩子什么样的影响？会昭告社会什么样的启示？

永州母亲唐慧因女儿被强奸案多次上访，被劳动教养一年半，她将永州劳教委告上法庭并获得胜诉。沈阳母亲张晶为求杀死两名城管的小贩丈夫夏俊峰免死，奔走数年，终于没能摆脱失去丈夫的悲剧结局。两案终篇看似一悲一喜，却很容易找到类比的要素：弱势，执著，社会力量的呼应，案件的典型意义。

对这两位母亲的评价，同情者固多，异议者亦夥。然而寄望于个案冲击制度的围观者必须意识到：弱势不代表道德高尚，执著更需要强大的心理支撑——换句话说，能搅出这么大动静的草根，一定是也必须是传统蔑称中所谓“刁民”，自古民怕官，但官也怕刁民，因为刁民才拥有捅破官官相护之潜规则的能量。一方面社会当鼓励“刁民”成为打破制度坚冰的先锋，另一方面社会也当宽容她们做出的利己选择，不应加之以道德枷锁——套一本书的名字，是要“容忍刁民不完美”。

“梦鸽救子记”具备了法庭伦理剧的一切要素。从坚称儿子“嫖娼”到指控酒吧勒索，梦鸽这种血战到底的信念，与李某某同案嫌犯律师（以李在珂为代表）比较现实的“两套辩护策略”（根据情势来选择是否为代理人选择无罪辩护）构成强烈的冲突，同时也在挑战大部分媒体与公众对此案的认知。虽然不乏旁人认为梦鸽爱子之情无可厚非，但她的选择是否明智，则争议大起。梦鸽顽强地选择无罪辩护，是完全相信儿子所言？还是家庭名誉输不起“嫖娼—强奸”的指控？她不被看好的孤军奋战，是为了儿子还是为了自己？

母亲们也是律师们走红的助燃剂。一年下来，很多人记不住大案要案中的辩护律师，但大家在反复的辩难与发布、争执与反目之间，

记住了浦志强、陈有西、田参军与李在珂。

在上述诸事中，律师所起的作用自然不容小觑。基于中国社会的特情，律师不仅负责在法庭上折冲驳难，还直接参与到舆论场的互动之中。他们为当事人寻找舆论资源，为当事人设计公众形象，或自己担当发言人角色，他们的表现直接引导着舆论对于控辩双方的关注与观感，以致“律师斗法”成为舆论大戏的局面时有出现。这究竟意味着法治的进步还是法治的不成熟？律师们自己变成新闻焦点人物是不是一件好事？法学界对此颇有争议。但无论如何，律师在 2013 年舆论场中，构成了一股重要的博弈势力。

让人感慨的另一现象是“父亲的缺席”。已经去世的夏俊峰自然只能将守护儿子的全部责任留给妻子张晶；唐慧丈夫张辉似乎只是在唐慧身陷囹圄时，才出来接受零星的媒体采访；而父亲李双江，仅有一审判决后扔给媒体“身体还好，心情不好”的寥寥数语。是中国的父亲们认为儿女的事应该首选母亲应对？还是他们羞于承担教育失败的责任？从中我们似乎可以辨识出中国社会亲子关系一大特征：抚养教育孩子的责任严重向母亲一方倾斜，父亲则仅以挣钱养家光耀门庭为满足。

湖南卫视《爸爸去哪儿》的爆红也许能提供一个佐证，这个从韩国移植来的亲子秀节目以观看男性明星艰难照顾子女，以及两代之间的尴尬沟通为卖点，据说热心观众多为女性，这算是对亚洲父亲单一角色的一种自我解嘲与精神弥补吗？

“小时代”

毛泽东有句名言：战略上藐视敌人，战术上重视敌人。观察获得

众多粉丝的《小时代》造成的传播现象，我的意见是反过来：技术上藐视之，意义上重视之。我认为，电影《小时代》上映后引发的争议，是一场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战争，而在战火纷飞的背后，这个时代投影其上，它的部分轮廓由此清晰可见。这，还不重要吗？

正如有的网友说的“郭敬明占了一个好名字”，郭敬明很可能用这部电影本身，而非其中的内容，说出了时代的真相。查建英就敏锐地发现了“小时代”的英文译名不是“Small Times”而是“Tiny Times”，在郭敬明眼中，个人在时代的星云中，都渺小得如一颗尘埃。以尘埃之眼观世，世界会是什么样子？

陶子总是特立的，她是我周边唯一一对《小时代》有好评的人：“我觉得挺好的，它把上海拍成了一座新的城！”这话让我不禁莞尔，郭敬明“永远的敌人”韩寒的确说过《小时代》应该改名为《恒隆时代》（恒隆曾是上海浦西地区第一高楼，“集中了一批世界知名时尚品牌的旗舰店”），那也的确可算一个新上海——相比之下，贾樟柯为世博会拍的《上海传奇》总免不了落套地用弄堂与外滩开场，那些都是历史，新人类们谁在乎呢？

“不在乎历史”真的是“小时代”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质。杨庆祥在他那篇影响颇大的《80后，怎么办？》中描述：“这些历史似乎是外在于我们生活的，历史发生了，但是历史的发生并没有立即对个体的生活产生影响。也或许可以这么说，在80后的成长中，历史是历史，生活是生活。”历史不仅意味着过往的人事，还代表着遗产和债务，正如让人产生无力感的除了风云莫测的房价与股指，还有基于历史的各种“二代”。由此可以稍稍懂得为什么郭敬明的粉丝在为他辩护时，总是强调“你们不知道他有多努力”，因为没有先有的历史资产，郭敬明创造出的虚幻美景，以及他自己的商业成功，才值得广大草根粉

丝用以寄托他们的欲望与想象。在个人努力的中产梦已经被普遍存在的“蚁族”、“房奴”击碎之后，《小时代》还为他们保留着最后的甜梦。

张悬在英国演唱会上张开青天白日旗，被内地留学生呛声“no politics today”，是一桩颇具寓意的个案。在呛声者与她的支持者看来，无须去清理与辨明青天白日旗与“台独”、“政治”之间的细微纹理，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能否获得“fun”，正如张晓舟在《小清新统一大中国》一文中指出的那样，“台湾”被这些“要乐趣不要政治”的拥趸们轻松而严重地符号化为“小清新”与凤梨酥了。他们无须深刻与沉重作为力量的来源，他们的力量源自群体，这也可以解释那位呛声者愤愤于现场的“同为内地留学生”为什么不出来支持她。

有意思的是，被认为对统一深怀疑惧的台湾，却对五星红旗的落地展示无所反应，李雪健用他领取金马奖时佩戴的徽章证明了这一点。或许两个场面的差异，显示了“去政治化的政治”与“非政治化的文化”之间的区别。

不知你是否留意到2013年的另一吊诡现象：《汉字英雄》、《汉字听写大会》等以生僻字词为卖点的电视节目走红一时，香港演员黄秋生却因为感叹内地少人识得繁体字、“华夏文明已死”而遭到大批网民围攻。景军在《神堂记忆》里研究判定：“对复杂文体、繁体字及独特表达方式的综合使用，其实维护着人们共有的一种观念，即只有古奥、讲究、难懂、神秘的语言才可视为神圣的语言。”神圣语言是维护传统权威的隐秘符码，“将世俗世界挡在外边”。是啊，黄秋生的悲叹可能过于感性与简单，但那些认定“文字只是拿来用的，能沟通就好”的反驳者，是否就配得上他们如此自信的姿态？

在“小时代”里，历史是外在于生活的，但也是被生活自动放弃

的。《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》也好,《中国合伙人》也罢,历史只是怀旧故事与励志传奇中零星的点缀。“小时代”里,每一代人都在重生,都活在当下,紧盯身边的现实。他们放弃了历史,也放弃了未来,放弃了丰富及丰富的痛苦。他们用“小时代”替换了“大时代”,把中国梦浓缩成中产梦。这不一定是坏事,但如果它被时代置顶为不容置疑的价值观,问题就凸显出来了。

在《旧制度与大革命》中,托克维尔写道:“在这类社会中,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,每个人都苦心焦虑,生怕地位下降,并拼命向上爬;金钱已成为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,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;它不断地易手,改变着个人的处境,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,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。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、对商业的嗜好、对物质利益的享受和追求,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。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,甚至深入到一切与此无缘的阶级中。”真正认同《小时代》的观众,主流群体恰恰是那些还未触及人世艰辛,还会为表面的光影与说教所惑者。然而年长一些的观众,他们追怀八九十年代,又何尝不是借往昔的“纯真”,来遮掩今日之市侩现实?郭敬明坚信:“你教育小孩你一定是好好念书,考上一个好的大学,找一份好的工作,这样才能娶上好的媳妇儿。就算你不这样,我相信万千父母也是这样,对不对?”难道他没有说出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?

自动放弃历史的,并不仅是《小时代》和它的粉丝们,也不仅仅是失去上升渠道的年轻人。关于“在商言商”的争议说明了什么?中国商人自近代以来,几乎从未摆脱过“官一商”的成功模式,官员离不开商人的合作与服务,但是不允许他们公开地分享政治权力。几乎每个听过中学历史课的人都知道:民族资产阶级是软弱的。1911年的

上海商团拥有远较当地政府为多的各类资源，但他们仍然不愿推出自己的代理人，拱手将自治权让给军政府。一部近代史里，如果没有外国势力撑腰，商人在政府面前总会显得卑微无力。

商人可以远离政治，政治却不会放过商人。如经济学家们的判断：当今中国，经济是最大的政治。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实力是中国政府最丰厚的政治资源，另一方面经济的繁荣增长也是安抚民众最好的麻醉剂。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经济问题的回应相当全面，对经济改革的力度也有承诺，却不曾提到商人有何渠道表达他们的诉求、争取他们的权利。这种“一条腿走路”是否真的可以纾解潜在的巨大冲突，维持商人对中国未来的信心与投入？不妨拭目以待。

幽暗的光

我愿意顶着一些不屑与猜疑的目光，再度提起张晖。于我个人而言，张晖的溘然辞世，是我在2013年经受最大震动的事件。因为此事，我首次从事了捐款号召者与收集人之一的陌生工作，同时也公开对中国学术体制进行了被认为是激烈的批判。

除去恶意的猜测与指责之外，我听到了一种反对的声音，如某前辈在微博上评论：这些事（经济压力、体制不公）私下说说可以，公开谈论，即不得体。于是我反复思量：为什么公开谈论被认为“不得体”？

中国“士”的传统是“君子忧道不忧贫”，是“明其道不计其功”。对于已经“沦为”以专业研究为职业的当今智识者而言，再坚持这样的要求，既不公平，也不现实。这样说并不是主张所有的智识者都戴上犬儒的面具，在官员与商家的手指缝里分一点残羹，相反，